

第六章 殖民地文化统治与教育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经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①这一论断，概要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搞“剑与火”的武力征讨同时，也给我国东北人民套上了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

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专制统治，是和“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同时开始的。

一九三二年，当伪满洲国刚刚出世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便在伪政府中设立了思想统治机构，即资政局弘法处。这个资政局是由积极煽动满蒙狂、大造侵华舆论的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组织和具体领导的。它一成立，就忠实积极地为这个傀儡新“国家”效劳。这从弘法处承担的三项任务中看得很清楚：第一项，所谓“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②这是替伪国家涂脂抹粉，把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9页。

^② 《资政局官制》，见《满洲国法令辑览》，1933年伪满国务院法制局出版，第81页。

偏政权说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把法西斯统治说成是“王道乐土”；第二项，所谓“涵养民力，善导民心”，实际上是妄图用“文治”征服民心，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三项，所谓“普及自治思想”，目的是强行灌输“独立”思想，把东北从整个中国分割开来。

弘法处的活动，是一方面围绕上述三项任务为巩固伪政权大肆张扬反动舆论，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培训人材，以加速推进侵吞全东北的步伐。为此，资政局弘法处曾办了一个训练所，招的全是日本人。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情报处便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它派出大量“宣抚人员”，充当关东军的别动队。关东军“讨伐”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会同时出现这种从事思想宣传的“宣抚”队员。

总务厅情报处还统管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由日本人统揽国务院全权，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根据伪法令，弘报处的任务扩大为九项：（一）控制舆论；（二）控制文艺；（三）主管“主要政策之发表”；（四）领导和监督报道新闻机关；（五）控制宣传资料；（六）管理出版物、影片及其他宣传品；（七）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八）掌管情报；（九）除上述诸项外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总之，它统辖包揽了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

为了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弘报处设立了三个科：监理科，主要是监督管理文化宣传机构，以及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调查；情报科，主要是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通报，以及加强情报联系和控制；宣传科，掌管宣传计划和宣传联络工作，以及对内对外重

要文化宣传的开展。

从这九项任务和三科的分工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文化机构的殖民统治和军事侵略特征。新闻、出版、文艺、电影、宣传资材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不置于官方的直接控制下，只有实行法西斯统治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伪满洲国则从一开始就由日伪政权直接控制，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后更是实行全面统治。这是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的明显表现。

一九三九年，伪国务院总务厅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弘报处实行体制机构改革，调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任弘报处处长。伪满协和会和农事合作社等，也是从事刺探中国人民思想动向的机构。为了协调这些机构同弘报处的分工，当涉及到搜集情报和地方性宣传工作时，弘报处主动加强同这些机构地方组织的联系。同时，在各级伪政府中设立和增加“弘报”人员，以调查和掌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行为，以便进一步进行镇压。

一九四一年，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伪治安部对于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的审查，以及监听国外短波；伪民生部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行政工作的领导；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等，都转归弘报处统一管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的新闻和通讯，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公布了《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全面垄断了新闻和通讯。为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法西斯统治，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还发布了《艺文指导纲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弘报处同关东军紧密配合，鼓吹大东亚战争，催逼东北人民为日本提供钢铁、煤炭、粮食等，并动员日本人民过“战时生活”，节衣缩食，卖命出力。

伪满时期，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统治机构并不只是一个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还有伪治安部警务司，伪民生部教育司、厚生司，伪司法部民事司、刑事司，以及协和会等等，在进行法西斯思想文化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方面，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当时，从伪新京到各级地方组织，都设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伪满的警察机构里，就有文化警察，还有种种特务，抓“思想犯”大都是他们干的。

在伪满的最高主宰者——关东军司令部内，设有报道部和调查部，也是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特别是在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关东军报道部和伪弘报处成了伪满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

2 “官制文化”

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统辖的文化机构手中。日本侵略者给这种文化专制概括了一个恰如其份的名字，叫“官制文化”^①，很显然，所谓“官制文化”，就是殖民地文化专制，法西斯文化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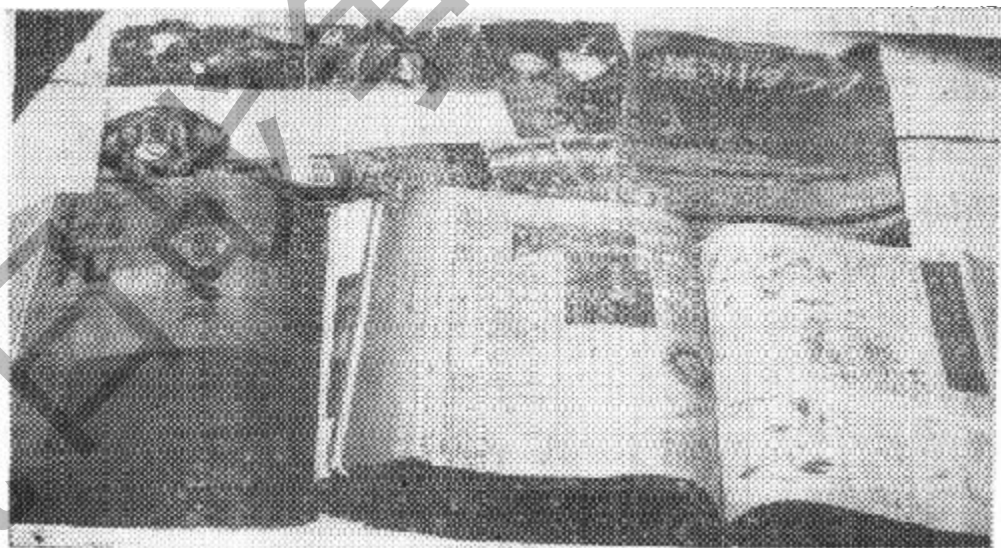
新闻、广播在现代思想文化宣传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一九三五年十月末，日本侵略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殖民政策，建立了严格管辖我国东北新闻、通讯的机构——“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

^① 《满洲建国侧面史》，日本经济社，1941年版，第361页。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再次强化其新闻通讯机构，使之成为侵华战争政策服务。一九四一年根据《国通社法》、《新闻法》、《记者法》，建立起改组的新的“满洲国通讯社”，由日本侵略者全部垄断新闻通讯事业。在报纸的出刊与发行上，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这就是《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合并了十八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三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六家报社。一九四四年五月，随着战局的发展，《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九·一八”事变前，刚刚着手建立的东北广播事业，在炮火中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九·一八”事变后，全东北的广播均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截至一九四一年，伪满有十八个广播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十分薄弱的出版事业，同样也在一开始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日伪很重视对出版事业的“统



满铁出版的“协和”杂志及伪满画报

制”。“九·一八”事变后”在打击中华民族出版事业的同时，加紧建立由日伪直接控制的出版机构。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伪满洲国建立了满洲图书股份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出版发行和销售伪满学校课本、所谓“国策”图书和其他有利于宣扬建国精神之书籍。一九三九年，建立伪书籍发行股份公司，进一步把东北图书发行、图书进出口工作垄断起来，同时，也协助伪政府有关文化统治机构从事图书出版审查工作。一九四三年建立了伪“出版协会”，这一组织把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都控制起来，其中的出版计划委员会，负责全东北图书审查和批准出版事宜；生产发行委员会，统辖全东北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在这种集中“统制”之下，就连稍与战争空气不协调的娱乐性出版物，也都被禁绝了。



伪满出版的杂志

日本帝国主义对电影的作用也极为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抵制中国抗日、排日影片进入东北，同时大量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宣传殖民侵略政策。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结了关东军、满铁、伪政府、协和会等各方面的

文化宣传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建立了由满铁和伪政府共同投资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垄断了我国东北的电影事业，包括摄制、发行、管理进出口影片等方面。一九四二年，伪满政府又决定把各地电影院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交给满映。满映的权势更加扩大，完全独霸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文艺部门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在东北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较深。因此，日本侵略者在控制这个部门上，颇费周折。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提出的《艺文指导纲要》，它成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反动纲领。《纲要》第一条就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其反动实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紘一字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伪满文艺，乃是日本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东西。

如果说，一九三三年《满洲经济建设纲要》的制订，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实行全面“统制”的开始，那么《艺文指导纲要》的发布，则标志着日伪统治者在把全东北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这个《纲要》，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拼凑适应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一方面加紧限制言论自由。在伪弘报处的领导下，伪满的文艺组织普遍进行了改组，先后建立起伪“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美术家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拼凑了伪“工艺家协会”、“摄影

^① 春山行夫：《满洲文化》，日本大阪屋书店1943年版第335页。

家协会”、“作曲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俳句^①家协会”等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由日本侵略者所主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在弘报处的指挥下，各地各种名目繁多的文艺团体纷纷出笼。在侵略战争日趋失败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充满着浓厚的杀气腾腾的战争气氛。“牡丹江文艺家协会”，会长是牡丹江省副省长（日本人）；副会长有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中国人，顾问共五人，全是日本人，其中包括日本驻牡丹江领事、铁道局长、宪兵队长、特务机关长和商工公会长。齐齐哈尔“艺文报国会”领导机构有三十一人，全部由日本人组成。顾问是伪黑龙江省日本人副省长、日本人铁道局长、日本人副市长。至于伪满的文化宣传机构，更是由军国主义分子中的骨干所把持。如日本战败前夕，“满映”理事长和“满洲艺文协会”会长，就是杀害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甘粕正彦；“满洲弘报协会”理事长高柳保太郎，原是日本陆军中将、满铁顾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夕，这种军事管辖文艺的组织，到处出现。那时文艺作者的创作计划都要送到弘报处去审查，或存档备案。

一九四二年，日本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条英机特地跑到会上打气，日本情报局次长、陆军省部长、海军省报道部科长等人都在大会上发言，极力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伪满政府日本殖民当权者也参加了大会，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一九四三年，伪满政府召开“决战文艺家大会”，贯彻“东京会议”的精神，动员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关东军报道部部长长谷川宇一在大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文艺家彻底为侵略战争而写作，提出什么文

① 俳句，日本诗体的一种，由5、7、5共17字组成。

艺要“先行”，作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这个期间，有不少日籍伪满作家，被征召到关东军报道部，充当“报道队员”，到前线或兵营去采访，为日益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做最后的鼓噪。

3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为了炮制傀儡政权，曾经拼凑了所谓“自治指导部”，拉了一批汉奸、卖国贼，搞“自治”、“独立”运动。在这个组织中的日本人手里，传递着一个秘密文件：《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其中特别提到：“对各种言论机关及集会等内部情况应特加注意，以绝灭排日思想”，“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①。这一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是文武两手交替使用，在大搞武力侵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人民思想文化的镇压。

一九三二年，溥仪一就任伪执政，则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等。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抛出的伪《出版法》，规定如要变革日伪“国家组织的大纲”，危及伪“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伪“外交及军事机密”，对伪“国交”产生“重大影响”之破坏行为，“煽动”对伪国家“犯罪”、“公开诉讼辩论”、“惑乱民心及扰乱财界”、妨碍伪“法官和警察执行职务”以及其它，都禁止出版。同年九月发布的《治安警察法》，针对当时人民抗日组织纷起，更具体规定了禁止人民集会的自由。规定要求，“屋外集会或公众运

^① 地形浩平：《自治指导部的回忆》，见《满洲行政》杂志，1939年6月号。

动”的发起者必须在开会十二小时前到管辖的警察署去登记。在街道及公众场所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读其它东西，警察可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禁止或扣留。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根据伪文教部记载，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七月，就在东北焚书六百五十余万册。沈阳市一家书店，存有我国关内出版的书未交出焚毁，因此，书店被查封，经理也被投进牢狱。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盖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十八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外还有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也均在禁止之列。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查禁极为严格。

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期间，中国革命的、抗日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书籍、报刊，禁止在东北出版，也不得从关内向东北运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书籍，更是日伪严禁的对象。据《满洲年鉴》记载，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七千四百四十五份，扣押五万六千零九十一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两千三百一十五份，扣押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份；禁止普通出版物三千五百零八册，扣押九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二册。一九三九年，输入的出版物仅以“公安”为由一项，禁止发行共七百四十三种（不包括被删削的数目），其中关内的出版物为四百八十八种，占全部查禁输入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四，居第一位。《满洲年鉴》声称：“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对日军诽谤的记事，关于诺蒙坎事件对日满军进行

诽谤的记事，以及排日、侮日、抗日的记事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记事。”^①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刻。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关内运往东北的出版物更是锐减。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而来，年年增加，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之百分之八十，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三六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五十八万七千余册，一九三七年就增至三百八十万册，一九三八年再增至一千余万册，一九三九年达一千四百四十余万册，一九四〇年高达两千二百三十余万册，一九四一年突破三千万册大关，达三千四百四十万册。一九三九年伪满进口日本报纸是五千四百九十四万余份，杂志八百二十七万余册，书籍一千四百四十余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数的十倍，杂志数的四百八十七倍，书籍数的十四倍。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有十五万余份日本报纸、两万两千几百份日本杂志、四万九千多册日本书籍涌进东北。

伪满十四年，做为形象化宣传的主要工具——电影，同样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酷控制。伪检查机关规定，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有损于日本侵略军的，有损于所谓“皇室”的，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于反战思想的，有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均被禁演。据日伪有关当局透露，一九三六年，禁演影片一百七十八部，其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及所谓危及伪政权而禁演的三十六部。一九三九年，列为禁演的有四十三部，其中中国影片占第一位，有十八部被禁。同时，日本统治者

^① 《满洲年鉴》1941年版第442页。

以“公安”为由，还剪裁影片，一九三六年为两千六百余米，一九三七年增至两万余米，到了一九三九年又增至二十余万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各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一九三六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一百五十四部，一九三七年升至二百三十二部，一九三八年一跃而至一千三百五十二部，一九三九年再跃为一千六百三十部。

伪满时期，以“思想犯”、“政治犯”之名，逮捕、监禁，乃至杀害中国人民，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关闭了东北的各大学和某些中学，并对具有抗日思想的教师、职工、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野蛮的镇压，甚至连嫌疑者也遭逮捕与清洗。一九三二年我国东北尚有中小学教师两万四千多人，而一九三三年减少到只剩一万六千人，其中的几千人被清洗或被迫改变行业。在沈阳、吉林、安东等地接连发生逮捕、屠杀抗日爱国教师和学生的事件。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在沈阳市第三中学制造的镇压事件，一次就捕杀爱国师生三十五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员的镇压则更为残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学生到关内学习的正当要求，也百般加以限制和阻挠。伪滨江省公署曾为此向各县发布通令，内称：“各县现在仍有多数在中国留学生，殊深遗憾。”通令规定以后东北人不得到关内去学习，而在关内毕业的东北学生，回东北后，各单位“一律禁止采用”。^①日本殖民统治者为割断中国关内、关外的联系，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限禁手段。

在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制下，中国东北一部分爱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有些人参加了抗日武

^① 《文教月报》(伪满)第16号第37页。

装队伍，也有一部分人被迫逃亡关内。受鲁迅培养关心的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就是在日本侵略东北之后，设法逃到上海的。肖军写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肖红写了小说《生死场》。鲁迅特为《八月的乡村》作了序说：“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明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还说：“此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①当时，不容于“满洲帝国”而逃亡关内参加抗日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很多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二、殖民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文艺

1 反动的“种族优劣”论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和强化其殖民统治，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宣扬了一套反动的谬论。他们公开宣称：“满洲国”是“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发展”^②，是“日本国国土的延长”^③，是“日本国的分身”^④，是“大陆的日本国”^⑤。这就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日本帝国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227—228页。

② 田村敏雄：《满洲与满洲国》，1941年，日本东京有斐阁出版，第6页。

③ 《满洲文化的历史与构造》，东京经济社1943年版：《满洲建国侧面史》第361页。

④ 田村敏雄：《新大陆政策的根本问题》，见《建国教育演说集》第4集，1939年出版。

⑤ 田村敏雄：《满洲建国的文化史上的意义》，伪满洲国教育会编，《建国教育讲演集》第2集。